

中国数字现代化对西方数字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陈 健

【内容提要】中国数字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具有超越西方数字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数字现代化以数字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为基础，以数字劳资关系的和谐统一为方向，以数字景观秩序的正向重塑为举措，以数字资本权力的引导规制为重点，创造了一种数字现代化的崭新图式。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数字现代化可实现数字文明对数字霸权、数字包容对数字鸿沟、数字治理对数字殖民、数字共享对数字垄断的重构，统筹推进了全方位的数字现代化建构。今天，实现全球数字现代化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要筑牢推进全球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国内基础，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引领全球数字文明新时代，以数字领域务实合作奋进全球数字文明新征程，以数字劳动生产创造全球数字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数字现代化 西方数字现代化 数字文明 数字霸权

作者简介：陈健（1982-），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20）。

数字现代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就数字化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而言，一方面，现代化包含数字化、智能化等在内的一系列内生命题，由此呈现了现代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丰富表征，以及在建设路径上的独特创新；另一方面，数字化内嵌于现代化中并积极推动着全球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特别在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等层面突出数字化的强大动能。中国数字现代化作为数字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为中国人民带来巨大权益，也为世界其他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譬如我国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就是数字现代化的正面写照。中国作为“数字丝绸之路”的技术输出国，不断加强自身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推进5G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沿线国家和人民可以享受便捷的互联网服务，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

不可否认，世界数字现代化进程发轫于西方，但是西方数字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是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数字化，其数字化不仅不会为人类造福，反而会加剧南北国家发展差距，使得数字鸿沟逐渐拉大，财富不断集中在西方国家的大财阀、资本家手中。作为资本家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还会利用数字领域的先发优势实施数字霸权，侵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侵犯发展中国家网络空间主权、盗取发展中国家核心机密、遏制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创新和发展、剥夺世界人民平等享受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权益，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利用其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势输出数字产品，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的资本中心逻辑，导致其在这些国家内部也会造成本国人民不能共享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益处，造成本国内部数字差距日益加大。

^①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现代化，也是一种带有剥削性质的数字现代化，今天新一轮的资本剥削全球化已经在进行之中。这种剥削坚持美元的金本位，就英伟达（NVIDIA）来说，作为一家大型的美国跨国科技公司，它通过美元的基础作用来剥削全球资本，实现全球的数字垄断。

与西方相反，中国数字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数字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一种农业、工业、教育、法制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数字化建设格局。中国的这种数字化发展不仅能促进全体人民平等共享数字化权益，还能为世界各国包容性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以包容性理念推动世界数字化进程，缩小南北国家数字差距。因此，中国数字化是以坚持人类整体利益为中心的数字化，是有利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发展的数字化，其在发展路径和发展目的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的数字化存在根本区别，具有超越西方数字现代化的显著优势。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桎梏，其数字化必然走向一种全球性的数字霸权和本质危机，而我国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全体人民的核心利益为根本追求，必然会有效应对全球数字垄断，向着开放、安全、可持续的数字世界不断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①只有在数字化发展上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全球数字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深入挖掘“中国数字化对西方数字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展现就成为一个值得深耕的学术课题。因此，本文选取“数字化”为理论棱镜，透视中国数字化对西方数字现代化的理论超越与实践重构，试图以数字化促进生产方式变革，为其他国家的数字化路径提供一种全新选择，走向开放安全、互利共赢的数字化时代。

一、中国数字化超越西方数字现代化的理论可能

数字化致力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客观限制，通过数字技术施加于人类生命，向多维的生命体验敞开，从而尝试开启一种革命式的人类发展路径，这一路径通向新型的社会文明建构，致力于绘制一种可能的人类解放的世界图景。在其中，西方数字化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由资本逻辑所宰制的诸平台、诸社会、诸景观、诸权力建构的局部数字化，这种数字化一味追逐单向度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一种健康可持续的人类生活世界建构，具有短视性和狭隘性。与西方相反，中国数字化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路径的伟大创新，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数字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为基础，以数字劳资关系的和谐统一为方向，以数字景观秩序的正向重塑为呈现，以数字资本权力的引导规制为重点，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数字化图式，在理论层面具有超越西方数字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1. 平台悖论消解：从资本主义的平台应用到社会主义的平台应用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平台数字化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一种新业态和新模式。这种平台数字化构成了一种跨时空的交易形态，也是数字化在经济层面的最新表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台数字化实质上是一种数字平台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数据在平台上的运作流通模式，其以数据-流量的收集、使用、监控、分析为基础，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来协调不同群体的活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平台，比如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精益平台等，资本利用这些平台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造成了平台运转问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1页。

题。一方面，数字平台成为一种新型监控模式，它更加侧重对主体的数字行为监控，主体网络点击的海量碎片化数据成为监控的新对象。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暗模式（Dark Patterns）来实现资本增殖。这种模式是平台借由界面设计和算法推荐等来诱导、操纵消费者行为的模式，它使得用户陷入资本主义自我剥削的泥淖，形成无穷的数字资本增殖。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数字时代的平台悖论，即平台本身减少沟通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劳动时间；平台本身缩短工作距离，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扩大工作范围；平台本身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确证，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人日益异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台悖论不是由平台本身所引发的，而是由平台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这一悖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得以有效消解，实现了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

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平台运用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台发展的有效结合。换言之，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现平台发展的社会主义目的性和市场经济效率性的结合。而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具有系列独特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①。我国平台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平台经济的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人民利益，最大程度凝聚党、政府、企业的广泛平台共识。同时，为了维护好人民利益，我国还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如大力加强平台经济治理，相继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如2019年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21年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推动平台建设良性有序发展。因此，平台所引发的问题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生产关系问题，只有砸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锁链，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装置，才能让平台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武器。资本主义的平台运用主要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由此实现了生产社会化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和谐统一，可以极大消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实现平台的安全、有序、共享发展。

2. 劳资关系重塑：从资本逻辑的时空布展走向人本逻辑的根本追寻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②。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其次，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就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③。资本是资本家剥削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结果，没有“一无所有”和“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就不会有资本增殖，同时资本也是资本家再生产劳动过程的原始投入，是劳动力进行物质生产的资金前提。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相较于资本与劳动短暂的同时性，其相互分离的趋势则是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永续持存。这种劳资关系在数字现代化进程中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是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对数字劳工的剥削力度不断加大，这些数字劳工不仅包括高技能的数字劳动者，如软件开发人员等，也包括低技能的数字劳动者，即数字零工和平台用户，前者虽然工资优渥，但也面临着年龄危机和晋升压力，后者则在低工资、低保障、不稳定的“微工作”中为生计努力。这些数字劳工都在资本的宰制下进行数字劳动，为资本增殖谋取利益，受到资本逻辑的桎梏。

正如马克思所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① 不同于西方国家私有制基础上的劳资关系，我国的劳资关系建立在人民中心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② 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也是完善中国数字现代化进程中劳资关系的根本要求。其一，我国健全政策保护体系，确保数字劳动公平。针对数字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我国积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在劳资关系上也更加注重劳动人民权益，对不同数字劳动实行不同标准的梯度管理，保证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其二，我国积极打破数字垄断，实现数字劳动正义。数字资本集团依靠资本力量和技术优势，对数字劳动者形成了控制和剥削。而我国不断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的监管力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动态监管，并且畅通社交媒体、普通大众的监管渠道，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体系。数字劳动者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我国全力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这就表现在，数字现代化不仅可以促进新兴产业的集群化高质量发展，还能为传统产业带来发展生机，其可以融入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夯实促进包括数字劳动主体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同时，数字现代化的发展也带来了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发展的契机，助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包括数字劳动主体在内的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现代化的成果。

3. 景观生产转向：从数字景观的视觉殖民到数字景观的秩序建构

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生产了大量的数字影像集合，如短视频、电影、电视剧等。这些数字商品进入人类生活世界，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景观，人类社会也进入了以数字景观为表征的景观社会。而这种景观社会中的数字景观，正是数字现代化建设中的媒介表达，是对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景观背后其实是资产阶级霸权统治的操控秩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异化建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数字景观呈现为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也是论证需要进行数字景观正向建构的原因：首先，数字景观界面化的日常剥削。数字化装置介入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交往，生产活动不再需要鲜活的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而变成虚体与虚体之间的界面交流。如在元宇宙中，用户可以头戴 Vision Pro 进行劳动，这种劳动虽然缩短了时空距离，但是却建构了一个无产阶级主动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数字时代，而且这种剥削任何时候都可以存在。其次，数字景观熵增加的疯狂消费，形成一种视觉殖民。数字景观拜物教究竟膜拜的是什么呢？是表层的数字景观，还是其背后的资本力量呢？无疑是后者。由于资本的无序性和扩张性，数字景观的议程设置也表现出无序的特征，即不断介入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领域，而未曾考虑人类核心利益。最后，日常生活危机化的景观控制。随着数字媒介操纵日常生活，人类进入了一种私人生活的日常异化，构成了一种新型日常生活危机。在其中，资本主义数字媒介依靠议程设置和用户喜好，为用户推送大量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数字景观，导致数字时代的视觉殖民，人类成为日常生活的无意识奴隶。

放眼当下，如果我们不去占领数字景观的宣传思想阵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去占领。对于数字技术制造的奇幻景观，我们不是任由其发展，而是引导数字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其一，我国通过人工智能推荐技术，为受众推荐主流意识形态数字产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进行正确意识形态灌输和思想教育，营造一个风朗气清的数字环境，如我国通过对影视剧等进行规范和引导，打造能够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其二，我国借助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形塑意识形态的全媒体矩阵，使得受众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形象化和鲜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3页。

化,形塑智能化沉浸式的教育体验,增强意识形态说理的可信性和可行性。其三,我国坚持正本清源,严格审查数字景观的具体内容和视觉呈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数字景观在网络空间中弥漫。因此,我国积极形成“景观生产-定期督察-效度反馈”的全链条、全方位的机制,确保数字景观的有序生产。其四,我国积极克服数字景观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在这方面我们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数字景观积极服务人民。其五,坚持党的领导,促进数字景观的发展能够切实代表好人民利益,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今天,人们生活在信息内爆的数字景观中,这种数字化将万事万物置于一个抽象化、自动化、自主化的装置内,部分数字景观已经超出我们当初制作它的意图,人造技术物正在超出人的控制。而我国坚持人民的中心地位,不断祛除新型空间的具身性与视觉霸权,恢复数字化技术的工具作用,实现人的主体性存在。

4. 资本权力透视:从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到数字资本有序规制

数字资本是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资本新形态,它以资本现实的物理形态为表现,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形成了数字现代化的新型资本形态,呈现数字资本化的态势。所谓数字资本化是指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利用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等数字资源创造价值和收益的过程。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资本的数字化,所谓资本的数字化,即利用数字技术等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资本运营效率、增加资本透明度。但是无论是数字资本化,还是资本数字化,在不同的制度下存在着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通过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来实现资本增殖。结果往往是,数字资本权力占据了资本主义的通讯交往、信息传递、网络交互行业,并且不断向其他行业介入,构成了一种数字资本权力全球布展的西方数字现代化。但是,西方数字现代化仅仅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既定存在的承认之上,是一种私有制发展到顶峰的数字表现,这种私有制必然会与数字生产社会化产生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

与西方相反,中国数字现代化则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坚持在“两个必然”中实现对资本主义危机和霸权的批判,通达了一种全新的数字现代化。不可否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但是这种占有仅仅是部分占有。这是因为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虽然包括个人或非政府机构拥有的私有制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社会总资产中公有资产占有显著优势地位,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我们要辩证看待数字资本的社会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又要发挥数字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数字资本发展的良性融合。对标数字资本的双重性内含,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绿灯”,引导数字资本有序扩张。这是我国发展数字资本的方式定向。基于此,一方面,我们要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灯”,依法监管资本使用,防范数字资本无序竞争,严格划定数字资本流动区域和作用范围。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数字资本设置“绿灯”,发挥数字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其二,驾驭数字资本助力共同富裕。这是我国发展数字资本的目标定向。共产主义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因而社会生产也必然是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为目标。因此,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推动数字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夯实物质基础,促进人民共同富裕。

二、中国数字现代化重构西方数字现代化的实践可能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

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① 在厘清中国数字化超越西方数字化的一般原理和理论基础之上，还要从实践创新层面来把握中国数字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因为数字化归根到底是要在实践发展中解决的真问题，是要惠及全体人民的数字成果。由此，基于新时代新征程数字化建设的新举措和新思想，尝试在实践层面勾勒中国数字化超越西方数字现代化的具体优势，统筹推进数字中国的整体擘画。

1. 数字文明对数字霸权的重构

数字霸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助数字技术对世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军事领域进行的多重渗透，也是西方国家在战略层面对世界进行的霸权统治。这种统治主要表现在：其一，数字经济层面，以控制论为基础的数字平台和网络等成为西方国家谋取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西方国家居于全球数字产业链的核心地位，掌握着大量数字平台设施、芯片和纳米技术等高精尖科技，占有数字产品利润的大头，而其他国家则长期处于数字产业链低端。其二，数字政治层面。西方国家不断进行数字地缘政治的全球布局，划分敌友关系，将中国、俄罗斯等视为数字地缘政治的强有力对手，还建立广泛合作的数字同盟关系，试图建立全球数字政治霸权。其三，数字军事层面。当今的国家军事力量争夺，不再是肉体对肉体的厮杀与角力，而是一场看不到硝烟的数字化战争。由此，以数字霸权为战略的西方数字化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风险，增加了全球发展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而我国谋求数字文明建设，以数字化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共享数字文明福祉。中国数字化建设坚持长远规划和本土适应，不将本国的数字发展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主张各国基于其现实国情制定本国的数字发展战略。

具体来说：首先，我国对标构建数字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创新任务，加快数字文明与中华文明接榫，积极推动“一个结合”向“两个结合”的承继式转化，形成国内共促数字文明建设新格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全世界最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形态，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②。我国大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数字文明相结合，打破西方帝国主义数字壁垒，建立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文明新局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内嵌于数字文明之中，可以凝聚各国人民核心数字利益和广泛数字共识，实现各国民心互通。其次，我国对标数字文明开放互促的交往规则，加快推动全球数字文明对话协商，形成国际共促数字文明交流新模式。各国在数字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数字利益冲突，我国通过积极同国际机构对话协商，求同存异，实现利益最大化。最后，我国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关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数字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率先加强周边国家数字化建设，提高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周边国家区域合作成效的取得，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数字化国际合作建设实践之中，助力全人类的数字化进程。如，以“中国+中亚五国”的数字贸易、数字合作、数字产品往来为实践探索，加快推动数字文明示范区发展，形成国内国际共促全球数字文明建设的新格局。

2. 数字包容对数字鸿沟的重构

数字鸿沟是在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群体、人口由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数字结果的差别所造成的数字两极分化。当今，全球数字鸿沟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差距。西方国家虽然数字化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其内部也存在问题。如美国的数字鸿沟问题就非常突出，约一亿五千万美国居民由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② 参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成本等原因无法享受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同时，种族、性别、收入等问题也在影响着美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美国也通过宽带补贴、公私合作等方式来消弭本国数字鸿沟，但是在资本中心逻辑下，美国政府不可能投入过大，因此成效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①。因此，我国努力实现数字包容对数字鸿沟的重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我国加快数字技术赋能数字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高数字现代化发展效率。我国通过数字孪生对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进行三维可视化分析，模拟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实时监测和优化生产过程。通过数字孪生，企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并优化供应链管理，实现国家整体层面的数字现代化水平提升。同时，我国将数字中国建设作为明确发展方向，加快各领域、各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为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其二，我国坚持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协调联动机制，缩小不同群体的数字收入差距。我们以初次分配为基础，提高发展数字经济活力，以再分配为重点，调节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数字收入差距，以三次分配为补充，强化社会各界的公益意识，完善数字经济分配的体制机制，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现代化。其三，我国加快推进数字化助力教育现代化，进行数字技能培训，增强国民的数字使用能力。如我国积极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数字设备和技术条件，打破区域、城乡之间的数字教育壁垒，最大程度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普惠。其四，我国加快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贯穿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原崛起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的实施和推进之中，为人民共享数字化红利带来便利和可能。

3. 数字治理对数字殖民的重构

西方式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殖民的现代化过程，是以剥夺其他人劳动为基础的原始积累过程。“任何社会形态或地域被拉入或将自己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都必须在原始积累的法则之下，经受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广泛的结构、制度和法制上的改变。”^②西方式现代化过程正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其先后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两次世界大战阶段、非暴力性和平演变阶段，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大卫·哈维曾指认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着剥夺性积累，“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③。今天，剥夺性积累正在从传统的领土瓜分转向数字空间殖民，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殖民统治方式，即数字殖民，具体包含着双重殖民逻辑，即数字技术殖民和数字意识形态殖民。首先，数字技术殖民。数字技术殖民是数字殖民的硬殖民方式，如西方发达国家雇佣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人员，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数字虚拟迁移，将这些“廉价”劳动力嵌入经济全球化的数字殖民体系。其次，数字意识形态殖民。数字意识形态殖民是数字殖民的软殖民方式，其主要通过互联网对公众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炮制国际虚假信息，进行意识形态和平演变，从思想上瓦解其他国家民众意志。西方数字现代化的殖民方式造成了人类在数字社会中的异化形态，而我国则提倡以数字治理为特征的数字现代化，重构了西方以数字殖民为特征的数字现代化。

一方面，我国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治理根基，自主寻求技术创新发展，构建新时代数字中国治理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数字发展的基础。我国不断进行原创性技术的科研攻关，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问题，加强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率先抢占未来科技发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28页。

②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③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0-121页。

展的制高点。另一方面，我国积极重构具有中国数字主体性的世界话语，建构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中心的国际数字话语体系，维护好世界各国人民的数字权益，使得数字现代化发展能够代表好人类整体利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球数字治理”的新思想、新论断，并作出了系列相关新部署。但是如何使得这些论断的中国叙事转向普遍性世界话语，是我们今天必然要面对的时代之问。基于此，我们不仅揭露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资本中心的本质面目，更在国际社会上积极发声，建构面向不同国家的方式多样化的国际传播力量，大力提振中国数字话语自信、创新数字话语表述，建立长期有效的数字治理对话机制。在这方面，中国还以切实举措促进世界各国共享数字现代化发展成果，如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破解“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字化水平较低等问题，助力实现南北国家数字鸿沟的缩小。

4. 数字共享对数字垄断的重构

数字垄断是以数字跨国公司为主体，以数字技术垄断为手段，以追求超额垄断利润为目的的现代垄断形式。数字垄断实质上将科学歪曲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利润最大化的不正当数字实践。“凡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①。由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垄断建立在剥削民众的基础之上。今天，随着数字资本巨头的全球性垄断，各国人民都被卷入数字漩涡，遭受着剥削、奴役与压迫。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中国数字化正是对西方国家数字垄断现象的批判，致力于通过数字共享让所有群体都有平等机会从数字设备、数字技能、数字资源中受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数字共建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础和目标，不仅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进举国体制不断向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发展，也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数字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数字关切。其次，我们加强数字共享顶层设计，推动数字共享的高水平发展。坚持发挥党对社会主义数字建设的全局统领作用，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高校-市场多主体共同发力的协同联动的高效创新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发展的制度范式。最后，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建设导向，推动反垄断调查和制度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数字局面，促进数字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资本主义数字跨国公司巨头垄断着全球大部分数字产业，压缩了发展中国家数字企业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国正在不断推动全球反垄断调查，如设立专门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协同，使得我国数字化持续健康发展。

三、中国数字化推进全球数字文明的未来进路

实现全球数字化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标，目前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数字化转型，并且在经济、政治等层面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数字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数字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数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实现跨越式发展，书写了数字现代化的崭新篇章。中国数字现代化作为全球数字现代化的一部分，必然要以自身的成功经验反哺全球数字现代化，努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拓展数字现代化路径，推进全球数字现代化发展进程。

1. 筑牢推进全球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国内基础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要想推进全球数字文明建设走深走实，首先就要修炼好数字化发展的内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①因此，我国更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筑牢推进全球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国内基础。

一是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方力量协同参与数字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首先，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数字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把握好平台发展的制度航向。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字思维和数字能力，高效使用平台技术促进资源流动和资源配置，实现公正有效的社会治理。其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着重选聘提拔具有深厚数字知识的党员参与组织建设，发挥其技术优势，也要增强全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形成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数字课程建设体系。最后，加强社会对数字现代化的监督作用。要通过媒体监督、互联网监督、社会团体监督等途径，形成监督合力，畅通数字现代化构建的监督反馈机制，搭建全方位的数字生态问题反馈场域，使得数字文明建设持续向好发展。

二是以数据现代化建设推动国家数据管理体系完善。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数据已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生产资料。但是，我国数据建设还存在发展与安全的内部张力，主要表现在内部行政冗杂和数据安全风险防范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协调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与各省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关系，以及明确中央与地方数据相关机构的权责关系，积极发挥国家数据局统筹协调数据资源的开发建设功能，推动数据助力数字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区分个人信息的数据性质，将其进行信息归类管理。如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个人信息要立法保护，涉及个人隐私的个人信息要依法保密，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要具体分析。

三是发挥大型数字企业在数字现代化建设中的责任和担当。数字现代化建设要发挥华为、腾讯、百度等大型数字企业的模范带头作用，明确企业主体责任范围。一方面要通过优惠政策和资金投入，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强化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生产装备自给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数字企业文化建设，特别要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四是加快推动数字现代化与其他产业互促性发展。要想推动中国数字现代化走深走实，就要加强数字现代化赋能其他产业。如加强数字现代化赋能农业生产，建立数字农业公共信息平台 and 特色农业产品宣传平台，加强不同地区的农产品对外销售能力建设，以此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整合效率。或者以数字化促进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数据要素投入较多的服务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服务业的市场化水平。

五是大力提高弱势群体的数字现代化水平，实现数字减贫。中国数字现代化必然是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成果的现代化。因此，提升弱势群体的数字化水平是关键。如边疆地区具有复杂的地区政治生态和少数民族文化，要运用数字技术缓和地缘矛盾，筑牢边境地区的数字保护屏障，防止境外势力渗透，形成民族团结的数字共同体。如乡村地区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足和农民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要常态化增加乡村专项资金投入和数字教育技能培训，深入推动数字减贫和数字乡村建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5页。

设,实现乡村生产数字化和农民知识水平数字化。

2. 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引领全球数字文明新时代

西方发达国家实施数字帝国主义战略,对其他国家数字企业进行数字入侵与数字打压,形成了数字资本的全球积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①基于此,我国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倡议正是在应对西方数字帝国主义、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中实现中国和世界互利共赢发展的伟大创举。因此,一方面,我国要推动以数字贸易发展为基础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今天,中国不断进行数字经济“外循环”,数字贸易成为对外拉动数字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不同于传统贸易,数字贸易需要搭建配套的跨境物流、数字服务以及数字产品。因此,更要放宽服务业的国际市场准入标准,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现市场发展与政府监管的协同联动,共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如我国积极推进与非洲国家的“丝路电商”合作与数字经济项目,实现线上线下贸易一体化,共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水平升级。另一方面,也要深入促进以协调数字纠纷为保障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当前,各国围绕数字税以及大型数字企业信息垄断问题存在着争端。以数字税为例,科技发达国家要求减免数字税,保护数字巨头的经济收益,科技较不发达国家要求征收数字税以保护本民族数字企业。因此,我国要积极构建合理化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制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提高全球经济发展韧性。

3. 以数字领域务实合作奋进全球数字文明新征程

数字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数字领域务实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实现全球数字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密切观察、主动作为,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②由此,拟提出如下路径:第一,加快数字科技领域合作,发挥中国在发展数字科技等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中国数字科技等新质生产力发展迅猛,数字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持续提升,基于此,应发挥好中国在这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而且“新时代新征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的关键性战略举措”^③。为此,要着重加强新能源、新材料,如太阳能、纳米材料等的技术研发和科技运用,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创新示范园区,带动全国新质生产力赓续发展,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积极吸引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务实精准的科技合作。同时,中国还应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新质生产力,建立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第二,加快数字新基建,筑牢数字全球化发展根基。从供给侧夯实数字新基建基础,一方面,中国自身应加大在国内对5G互联网、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形成良好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各类相关企业还应加快到海外投资布局,如此不仅能够促进中国各类企业发展壮大,也能有力促进世界各国数字化进程。同时,也要从需求侧增强新基建的内生动力,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针对不同国家的发展基础和水平,刺激不同国家人民丰富的数字需求,增强需求的空间外溢效益。第三,建立数字领域务实合作的效果评价机制。要想实现数字务实合作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各国通过协商建立严格的考核评估倒逼机制,评价各国国际合作的产业数量与质量及其合作给环境带来的风险。第四,加强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8页。

③ 程恩富、陈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

际数字对话与政策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实现全球数字共同发展。据《衡量数字化发展：2022年事实和数字》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约有53亿人可以上网，但仍有27亿人不能上网”，其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人口使用互联网具有较高比重，为80%-90%，而非洲国家人口使用互联网比例明显偏低，只有前者的一半^①。因此，要发挥国际组织的统筹布局功能，同时积极促进各国数字企业的经济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提供资金援助与政策支持，实现包容式发展。

4. 以数字劳动生产创造全球数字文明新形态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手工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的变革，这一变革使得“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今天生活的基本现实”^②。数字文明新形态既承继了以往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又形塑了不同于传统文明的数字化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③不同数字文明形态的较量其实内含两重向度，一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制度较量，二是个人维度和社会维度的人性博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数字文明被纳入严密的资本统治，结果往往是一部分人的“文明”和另一部分人的贫穷，且二者处于激化对立状态。虽然部分西方左翼试图通过集体合作，以非物质劳动实现普遍智能和大众智能，但是这种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建设实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不会实现真正的数字文明新形态。而数字劳动生产就是推动数字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有效路径，关涉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方式的现代化重塑。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加快数字劳动与制度优势的有机耦合，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变革。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导致了人类日益异化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能最大程度激发人民数字劳动活力和保护人民数字权益。其次，加强全球数字劳动的价值引领，营造公平正义的数字空间，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变革。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并非基于单个人的利益，其最终是为了全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要明确数字劳动的价值导向，坚持数字技术的共建共治共享，从而创造全球数字文明新形态。最后，促进数字劳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赋能人类发展，推动人类生命方式变革。今天，随着人机互联、脑机接口等技术的革命式发展，人类身体不断与机器融合发展，形成了一种赛博格的现实存在。一方面，技术等的介入，使得人体失去的一些能力得以修复，实现了人体生理上的平等；另一方面，技术改造可以实现人类躯体能力的增强，如力量、视力等，以此加强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虽然这种后人类的赛博格形态还存在一定的伦理问题，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增强了人类生命体验的丰富性，推动生命存在方式的变革。

四、结 语

西方国家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但是并非世界历史的最终完成者。在理论层面上，西方数字现代化根植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少数资本大鳄的利益为核心，而不顾及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存在根本矛盾的数字现代化，必然导致统治危机。当前，随着世界数字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都迫切需要数字化发展，而中国数字现代化正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良药，是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打破西方联手控制局面的机遇。与西方数字现代化不同，中国数字现代化体现了“中国数字现代化”与“全球数字现代化”的积极互动，为

① 参见刘玲玲：《加强合作，缩小全球数字鸿沟》，《人民日报》2023年1月4日。

② 刘贵祥：《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数字资本的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世界贡献了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和智慧方案。因此，中国数字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造，它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其根本目的是以数字现代化为着力点实现人类文明进步，其原创性贡献是破解了西方国家数字霸权、数字鸿沟、数字殖民、数字垄断的数字现代化模式，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务实合作和联动发展，彰显了一种包容性的数字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基于此，只有不断以高水平的数字现代化为契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数字化建设的显著成果，才能切实推进世界各国的数字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 [2]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 [3] 辛向阳：《中国式现代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
- [4] [德]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黄昆、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 [5] [加]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 [6]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编辑：张 剑）

（上接第25页）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①。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属于“空间”层面的嵌入，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成效。要加强党对社区管理的领导，完善互嵌式社区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互嵌式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要加快形成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的评价标准，建立健全指标体系，开展有效有力的评价指导，确保高质量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要完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服务管理机制，促进各族群众流动融居，加强服务保障，使各民族居民形成共同情感，为形成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奠定基础。要充分发挥“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等各类实践平台和宣传教育渠道作用，加强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在交往交流中增进情感、增进共识，引导各民族将中华文化内化为共建、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
- [4]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
- [5]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 [6] 徐艳玲等：《从马克思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逻辑与现实向度》，北京：学习出版社，2023年。
- [7] 郑宏范：《打造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 推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建》2023年第2期。

（编辑：荀寿潇）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7页。